

# “兰州‘八办’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故事

□胡家龙

新中国成立75周年前夕，八路军兰州办事处纪念馆迎来了一批批观众，从中小學生到耄耋老人，大家带着热誠，满怀崇敬，学习和重温党和红军、八路军在西北的光辉历程，感受那段艰苦卓绝的峥嵘岁月……

### 为党献身常汲汲： 谢觉哉做统战工作的故事

八路军驻甘办事处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设在兰州的公开办事机构（也称“兰州‘八办’”），是领导甘肃抗日救亡、进行后方发动、实现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基地，也是西北国际交通线上的重要枢纽。周恩来同志亲切地将兰州“八办”誉为“革命的接待站，战斗的指挥所”。

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8月视察甘肃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甘肃是一片红色土地，在中国革命历史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抗日战争时期，甘肃是党和红军的战略大后方，兰州‘八办’为抗战胜利作出重要贡献。”

在参观酒泉路和甘南路两处旧址的过程中，人们驻足一个又一个展厅，凝视一件又一件文物，思索一段又一段说明，从丰富的展品和饱满的史实中深刻感悟党和西北人民不怕牺牲、顽强奋斗的厚重历史，深深地被那些反映革命先辈忠诚、勇敢、牺牲、奉献崇高精神的故事所感染、所打动。

1937年9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发表谈话，实际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标志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共产党在一些重要城市如武汉、西安、长沙、兰州先后建立了八路军办事处，谢觉哉成为党中央派驻兰州的代表。

时任甘肃省政府主席的贺耀组曾经是湖南的军阀，早在大革命时期，我们党派谢觉哉以国民党党员身份做他的工作，成功争取他参加国民革命。在兰州期间，谢觉哉也做了大量争取贺耀组的工作。《谢觉哉日记选》载，1937年7月29日，“下午1时乘欧亚机飞兰，4时抵兰。9时贺主席派郭顾问用车来接，谈至11时，回宿南滩街54号。今晚谈的是国共合作问题。贺对合作表示无疑。贺于国际情况知道一些，但于政治根本认识和我们尚有不少距离”。8月21日，“给贺长信后，贺表示对这些问题焦急，找不出办法，因此又给他第二信（9日），提出民运具体方法……我想贺已经有了进步了。16日夜的谈话，我更提出必须采用大刀阔斧的手段，且

不如此，群众以至军队都将对政府不了解。不料贺的态度反似后退，我知道我们原则上尚有相当宽的隔离”。9月3日，“晚9时同鸿宾往会贺。贺对教育、言论界、训练班的改革，还不肯急进，但比前已有进步。12时辞回”。到兰州月余，谢觉哉等经过艰苦的工作，以诚相待、讲理讲情、耐心细致，又坚持原则，向“不正确的观点开火”，使贺耀组有了一定的转变。特别是贺公开宴请欢迎谢觉哉和兰州“八办”处长彭加伦，又讨论了“八办”提出的民运问题、军队整顿问题和甘、青、宁、新的团结问题，打开了“八办”在甘肃国民党上层人士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局面。

此后，谢觉哉和办事处的同志们利用一切机会，宣传党的政策主张，团结各界拥护抗日的人士，取得很大成果。比如，团结争取了新一军军长邓宝珊，其二女儿邓友梅1937年奔赴延安，参加革命。同时，影响和帮助一大批进步青年前往延安，投身革命。

谢觉哉是我党老一辈革命家，年过半百毅然从江西跟随中央红军走完万里长征，在陕北短暂工作即由党中央派驻兰州。在兰州“八办”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会谈、演讲、调查、研究，夜以继日、不辞劳苦，仅在各报刊发

表抨击时弊的政论、杂文就有70多篇，真所谓“行经万里身犹健，历尽千艰胆未寒”，这些无不彰显着他为党和人民事业鞠躬尽瘁的崇高风范。

### 侠肝义胆铸英雄： 高金城抢救西路军流落将士的故事

党中央在兰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营救和收容西路军流散人员。高金城、牟玉光夫妇是医务工作者，是共产党的忠诚朋友，他们在兰州开办福院医院，在各阶层群众中有很大影响。接受谢觉哉、彭加伦等的委托后，在甘肃特别是河西地区有广泛影响的高金城于1937年8月8日到达张掖，开办医院，公开收容流散红军伤病员，先后治愈和送回兰州“八办”的红军有200多人，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将领。他还派人下乡散发“兰州设有八路军办事处”的纸条，给流散红军指明回归红军大家庭的道路。高金城营救河西流散红军的活动，引起了马家军的敌视。1938年正月初四，马步芳部旅长韩起功将高金城秘密逮捕杀害。高金城牺牲自己的生命，为我们党保存了

一批宝贵力量，他的义举、他的功绩始终被党和人民铭记。1949年秋，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张掖，一野一兵团司令兼政委王震、二军政委王恩茂专程探望了高金城的遗孀牟玉光。1951年甘肃省人民政府民政厅追认高金城为革命烈士。1952年，中共甘肃省委在张掖召开纪念高金城遇难14周年大会。

八路军兰州办事处为党、为民族解放所做的工作很多，仅营救和收容流散红军以千人计，在兰州街头就收容了两三百人送往延安。上述故事仅是他们工作的一个侧面。

从1937年5月至1943年11月的六年间，办事处在党代表谢觉哉，处长彭加伦、伍修权的领导下，坚定地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除营救被俘流落的西路军将士、接待党的过往人员外，还在输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战前线、指导中共甘肃工委开展工作等方面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工作。兰州“八办”的重大历史贡献，与武汉“八办”、西安“八办”、长沙“八办”、重庆曾家岩、南京梅园新村等一起，必将汇聚成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壮丽图景，镌刻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辉煌史册上。

兰州“八办”的历史功绩永远值得我们铭记，红军的伟大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弘扬。

# 一直在怀抱

□梅子涵

中学毕业，我去了农场。那是大历史安排给我们的小历史，生活有些艰苦和单调。我正是在那个小历史里走进文学，学习写作，因为文学里有乐观、明亮、热情、诗意；文学的语言是那么高级，说着、念着，便惬意一着了，觉得自己有些水平乃至优秀。生活在文学面前获得新的叙事激情，每日的页码上有了诗。我们这一代人，在小历史里的年轻岁月，选择文学而栖居，是有着很浪漫的现实主义智慧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总在生命和艺术的深处无意相连。

所以，我的文学起步，便注定只写天真的可爱、蓬勃的热情、坚定的意志、温暖的关怀、动人的色彩、浪漫的诗意。初始的脚印还是幼稚，但纯粹，我后来无意地一步踏入儿童文学，正是因为精神里有一个可爱的安徒生锡兵。站立于农场田野的时候，我茫然未知后来的天地——后来的美丽天地，正好是由那儿走来。美好无须预料，属于自己的路，每段都珍贵。我的处女作就叫《征途》。

我是在一个重新苏醒的好年代，考入大学，离开田野，走进校园的。也是在大学课堂上，我十分认真地写下了正式的儿童文学初期作品。我真怀念那个普普通通的老教室，光线不明亮，安宁得满心甜蜜。田野已经离得那么远，我在方格的稿本上写下一个个端正的字。它像捡起的麦穗塞在口袋里，又一粒一粒落于土中。有的时候写下的句子醉心、自恋，完全应和心里的感觉；有的时候沮丧自己的无力，那些麻雀般叫声的句子，根本不在我最想要的枝干上叽叽喳喳。一个短篇小说的写成竟然也用了一个小“工程”的时间。

我真正的儿童文学处女作是《马老师喜欢的》。那是一个小学老师的故事。

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他们的标志并不是学问多么渊博、高深，当然，如果高深、渊博，那他们职业、讲台的高山、大海，学生放眼望去，自然是惊愕和崇拜。但他们如果瞧得见年幼、年少的学生们各自的溪流和山丘，理解、欣赏、爱憎，尊重地踏入，协助清淤，维护天真，于不见之间已经栽种种子，在成长的生命未来看见树干长出绿叶，像图画书《小种子》那样，后来居上，花朵满枝，这是不是基础教育更普通的景致，有着更漫长、深远的意义？

我一直很自豪在30岁的时候忽而醉心忽而沮丧地写出了《马老师喜欢的》那样的小说，用了整整十天的时间。那时候的校园，学业的脚步奔腾、欢腾，学文学的学生总以文学般的热烈注视彼此，目光、神采皆文学，好似都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好似都是鲁迅先生的弟子，议论着《爱，是不能忘记的》，流光溢彩着罗曼·罗兰式的句子。我是班长，也是《拓荒》杂志的主编，还是中文系刊物《文友》的主编。年轻的口气常常比力气大，心愿不是在心脏里，而是飞入空中，摇曳成一只十分酷的风筝。有的同学姚子明不知哪来的欢欣鼓舞，以漂亮的仿宋体刻印出马老师的故事，贴在橱窗里。女生们说：“我哭了好久！”

我写的时候也是眼泪汪汪。

中文系的首届文学评奖，它获了一等奖。它后来又在我从小就爱的南京获了一个更大的一等奖。没有奖金，但有一本蓝颜色的奖状。是江苏、南京的一个很大的文艺新闻，是一个很多年不会贬值的大光荣。我抬起腿，干干净净地跨入了儿童文学的大门。我是那么想念永恒的顾宪谟先生，我的作品编辑。感激那些我不认识、他们也不认识我的投票者们。那个年代，文学、艺术都庄重、严肃，一尘不染。

那是一个爱的故事。一个普通的女老师，一个更普通的女孩子学生。故事由女孩子作文本上的泪滴开始，故事的结尾是一个集体的人人的笑容。故事没有大波澜，但的确在阅读得泪水涟涟。

女孩是被马老师牵起放出的风筝；我写的这个故事，牵起了我这么一个文学的风筝，各自有了后来的景象。

我后来自己当老师了，也总以自己的小说《课堂》中的情感对待学生，虽然课业结束，他们离开，教室空空如也，但总有人归来，看看自己的课桌椅，想着他的老师。《课堂》的叙事是叙事归来，情感缠绵。

儿童文学是爱的文学，是于爱中分娩的文学。母亲总会喂养母乳，没有母乳，讨饭也要捧回一小把面糊。父母、长辈，他们的手、肩、背，浑身的力气都给了你。你是小，他们是大；你大了、高了，走路快了，他们老了、矮了、小了，走路走不动了。你独自往前奔，不牵着手，他们的依靠在哪里呢？我写了《走在路上》《写信》《饭票》《小脚奶奶》《外婆，你还好吗》《大小大》……母爱、父爱、长辈爱，都是一个人长大之后才渐渐读懂的故事，是《隔了那么久》的一首诗，回响于耳，惊动于心。我写儿童文学，时常满眼泪水。

宽敞的文学大路是读着而审美，写着前行的。铺就得讲究，才少有坑洼。多少的路塌陷，都是由底而上、里应外合的。美好的年代给了我们丰富、磅礴的书籍和文学出版，给了我们多么大多么活跃的一个文学大学，那个“阶梯教室”走啊走啊几乎都走不到最后那个台阶。我们总在不经意间已从高高的文学灯柱下经过。我懂得的更多了。给儿童写作，爱、天真、幽默感，语言明了、干净，不喧哗辞藻，语气、气息自然，任何恶毒都必须被善意、正义消融，尽量不在文学的叙述中上课、不教训……

《女儿的故事》是我的幽默写作的大处女作。一个孩子的学业路途是那么艰难，气喘吁吁、跌爬滚打，可是我写得嘻嘻哈哈。一个出版社的总编辑在火车上哈哈大笑地读这本书，列车员悄悄问她同行的先生：“她需要一点热水吗？”夫妻俩认真地解读列车员的关心后，恍然大悟：人家的意思是她需不需要吃药。

其实我写的时候，是流出很多心疼和忏悔的泪的。成长是那么不易，当父亲是那么难。我30多岁有了女儿，心里每天滚来滚去的都是对她的美丽心愿。可是第一次当父亲，心愿大，无

# 共和国同龄人



知也多，温柔如水，急吼起来，喊声似虎，只为一件事：大学啊大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学，哪是可能一口气读得懂的。有了她，才有了当父亲的机会，独生子女的父母，当父母的年龄是和孩子的年龄一样大的。因为有了孩子，他们才是父母。孩子可以声称自己正在成长，渐渐才能知道如何做人，如何当子女；而父母唯有自己闷声学习和检讨，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请原谅”，他们的泪水是自己心里的小溪。

女儿长大后，我写出了《爸爸的故事》。我写出了一群快乐小孩的连续故事《戴小桥和他的哥们儿》，不是只写他们天然的灵感和东奔西跑，从不忘记指出跑道上的那些实线、红线，正如同我的“先锋”之作《双人茶座》，两个少年走在路上吹着牛，吹着心头的暗想和女孩，走到十字路口，我一笔提醒：对面是另外一个区了，回头吧！

儿童向往成人世界，在文学里还是要艺术地告诉他们，生命不可逾越，规矩总是要有。不教训，却不能没有“艺术地告诉”。

我是国内图画书写作复兴起跑在前的人，写了不少本了，《李拉尔的故事》《敲门小熊》《麻雀》《行吟诗人》《三幅画》《下雪天的声音》《春天》《过年》《绿钢笔写的字》《饭票》《乡路》《谁最高》《我的矮矮》……我不为自己的写作“自弹自唱”，不当“吉他手”，拽不得，低调努力，来日方长。

十几年了，我每月写出一篇专栏散文。我不是写来便是散文，而是想艺术地写出些样子。散文和生活之近，是脚和路的关系。满脚的泥和灰，我像《金蔷薇》中的扫灰人，筛啊筛啊，只求找到星点金粉。文学如金，有金粉之心比捧起即是更合文学世界的大规矩，我热爱大规矩。《绿光芒》《黄麦地》《蓝天空》是它们的结晶。很多篇目成为朗读会上的声音。它们是写给成年人的，很多篇目却成为小学生、中学生的阅读分析题，进入中考试卷、高考模拟卷。这是养育了我的母语对我的再次养育，我被它的摇篮摇大，成为作家，它又继续摇我的作品。感谢亲爱的母语。

我与共和国一同成长，写诗。

为人、为诗都是在山路上，赤脚、草鞋、布鞋、球鞋、皮鞋，现在已换成老人鞋。我少小放牛、割草、砍柴，上坡下坡，挑担，滑倒再站起。那时学写所谓的诗，是用铅笔在手背和脚跟上，或是捡别人丢下的纸烟盒写作。现在，共和国崛起了，路有高速、通村公路，漫山遍野欣欣向荣，喊天叫地忙活（写作也是“忙活”）一辈子。天挂日月一双鞋子，只有昼夜配穿。我哩，一辈子四季走山路，从穿开裆裤学步开始，背的、挑的、扛的、抬的，一直跟着时势，一路号子。

我那时理解的诗是什么呢？听见雷声内心就发芽，看见好时光脸上就开花。就这么过来的，总认为诗思如雨丝，应是上天把大地牵挂。当然，历经岁月风雨，也有耕耘心壤、自我奋蹄时，鞭子就落在了身上。我身处贵州高原，与外界隔山隔水，隔不开的就是内心有块空地——历经中国的站起、富起、强起，作品该怎样像大山一样“雄起”，长出精神的粮食？

写作上，我只是一个不懈躬耕的老农。就诗而言，我认为还是要向天长久学习，指点迷津亦即要鼓舞人活下去，且让人活得是人；同时也要悟觉，生死茫茫典故，恒久拥抱此刻，背影似曾相识，倾心面面相觑。

我写诗，就像国之家里的一个小孩子从小到老，爬行、步行、奔跑、慢步……老了，想返老还童，想象爬向墓门的一行白纸黑字留下的痕迹，两侧有山川为眼界，字词携一口气能融入天气与地气，就谢天谢地。有道心底有生机，食用阳春一口，日月也明媚。我像青青草，年老依然不忘营养羊儿，让天意尝到入味，这也应是文学的魅力吧！

## 二

向祖国汇报。

我初学写作，是加法和乘法。加法，先是1+1=2，模仿；再是1+1=3，如同一人挑水，一根扁担加两个水桶，扁担之一横加人之一竖，似“十”，灵性。我读小学时写顺口溜发在校园墙报上，老师夸奖，同学佩服，进而学民歌甚而模仿写古诗，是乘法，自学乘以想象，有“瘾”。最喜欢作文课，喜欢美妙的字句与形容词。考入初中，从几十里外的乡村到县城，校园里有阅览室、图书室，校外有文化馆、新华书店、电影院、剧院、茶馆，可抽空去读不收钱的书，看“锅铲电影”或挤在茶馆门口听评书，增加了见识。于是模仿着写散文、小说，甚而写电影剧本。爱上诗，是见诗字数少，读起来有味，还可节约笔墨纸张，方便将自己的所思所想融入诗句。乘法阶段，就是多学、多悟、多练笔、多

# 写作与算术

□李发模

请教。我真正懂了有加有减法，乘有除法，是初中毕业回乡劳动和到工地上打工，再到宣传队创作节目之后。我慢慢懂得了勤学 and 自信是加法和乘法，且越是在底层越要减去抱怨和除以自弃。我有好运，一是父母家教严，二是读小学和初中时遇到下放到边远地区的好老师，三是创作途中有好的前辈和诗友。他们都很正能量，哪怕是国家处于艰难之时，他们仍鼓励我勤奋、坚持。直到我的长篇叙事诗《呼声》发表，创作的戏剧演出得到好评，国内众多报刊刊登我的作品，他们仍不吝指出我为人、为文的不足，并在方方面面予以资助。在成长的道路上，我还要感恩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作家班的导师和同学们。

我读书很杂，总感到创作有一种算术，除了自己的努力顺应国运之外，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术”在开启另外一道门，就看自己愿不愿进入。

## 三

写好“人”字就是诗。诗与人类命运有关，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运势血肉相连。诗是发给人春天的地址，告诉人勇敢地活着，生命也是一笔财富。人有“东风第一枝”——年轻的时候，也有“一叶知秋”——老了的时候。诗人从“时”与“运”中找准自己的位置，找准术数老祖宗赏赐的“如意如来地，守本本自无”，诗中情景破除的险阻生疑，是自由自在的自由自在。

诗写人性与命运，悲悯润之；诗意的走向不随波逐流，而知真理也是有时空面积的。诗难写，难就难在为人的格局、学识加阅历并乘以奇思妙想，再减、再除，历经打磨而闪烁哲思。我一直认为，“人”字撇捺，本来就是“公”和“私”的互撑。“公”是“八”方之内，要懂缩脚“厶”；“私”是“禾”旁，也要懂缩脚“厶”。缩脚之“厶”是要懂得忍让，“忍”是心上一把刀，切割虚妄，同时也是坚韧之“韧”。人懂忍让，人有韧性，“刃”用于作品出真性，才能感动时间。都说人有天命，其实作品也一样。“命”是知敬畏，天命是指“命”由“天”给，由父母所“生”。什么是“天”呢？民意；什么是“生”呢？民生。

时势在时空门前经过，作品在时势内外进出，能感知到什么？残雪被桃红烧了，李花该明白什么？某些时间被浪费了，其中有浪漫吗？日出圆圆如鸡蛋，云朵飞翔，作品回答那片云么？芬芳结果的甜蜜，谁是其中一元素？世界为人提供的想象，人经历过程中的风雨进入作品，字词挥动着手势……

创作的路上，一批人倒下，另一批人站起，所有的生命都在进化的路上走着，思维的交通总要留下安全的人行道。像我这样的人，知老之已至，以活为主业，其余都是业余，我的创作是“业余创作”，还活着，便要守好自我分寸。爱国，爱笔下一纸作品的土地，再咬牙学语，从一二三四五六七的算术开始吧！